

心性 与诗 禅

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

张
煜
著

心性 与诗 禅

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

张
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性与时禅：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 / 张煜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17-9464-7

I. ①心…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北宋②佛教史：思想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I206.2②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692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6CZJ005）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海富通基金”资助出版

心性与时禅：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

著 者 张 煜

特约编辑 黄曙辉

项目编辑 庞 坚

装帧设计 劳 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6开

印 张 28.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

印 数 1500

书 号 ISBN 978-7-5617-9464-7/I·896

定 价 60.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序

对于佛教与宋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学界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特别是研究江西诗派，禅宗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检点这个领域的成果，具有总结性的宏观通论，以及论述特定作家发展过程中与佛禅的关系，是不少学者喜欢采取的角度。张煜的这部著作《心性与诗禅：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则提出“文人”的概念，希望藉由特定时期文人的定位，引入一定的群体意识，结合生活、思想及整体创作来看待他们和佛教的关系。这一思路，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进入本书视野的北宋文人大致上是这样几位：王禹偁、杨亿、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苏辙、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作者排列出这样一份名单，似有其主观选择，因为这正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宋文人之间的传承。王禹偁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对欧阳修影响甚大。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作家之一，就此而言，欧阳修的文学理念与之有一定的距离，但从精神品质来看，二人契合之处甚多，特别是杨与钱惟演关系密切，而钱正是欧阳修在洛阳时的幕主。同时，在行事风格上，杨亿“喜海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宋史》本传），这也正是杨最为后人称道的品质之一。因此可以说，钱惟演对欧阳修的提携，其中或也有着杨亿的影子，而杨、

钱的这种风范，也在欧阳修的身上延续了下来。像王安石、苏轼、苏辙诸人都可以说是欧阳修的学生，而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又是苏轼的学生。这样一来，本书所讨论的北宋文人，就有了一定的前后传承关系，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文学活动，彼此也就有了一定的联系。

当然，学统上的趋同，并不意味着思想取向上的完全一致，他们对待佛教的态度，彼此就颇有差异，不过，这也正是宋代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即所谓和而不同，否则，像苏门这样的群体，也就不会各具面目，各有不同成就了。

说到对待佛教的态度，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欧阳修。欧阳修具有政治上极强的使命感，他继承韩愈的精神，希望在思想上救衰起弊，因此作《本论》，批判佛教，在当时影响甚大。而与此同时，欧阳修也和佛教中人有一定的交往，他的山水胜情，有时也多体现在佛寺游观上，留下了不少相关诗篇。一般说来，谈到这个问题时，人们大都认为，这是欧阳修在排佛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视野稍稍放开一些。欧阳修的排佛，肯定建立在对佛教了解的基础上。细察其排佛的基本理论，乃是不满于佛教对儒家基本规范、基本建构的冲击，是一种整体上的理性判断。事实上，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样的类似终极关怀一样的思考，更多的，可能也是由于某些观念而引起心灵共鸣，因而产生的感情取向。游观佛寺与交往僧人，从某种程度看，也与山林田园之求可以互相沟通。佛寺的位置，不必一定在偏远之处，对于士人来说，造访佛寺，有时比去到山林田园更加方便。而其所象征的不沾尘埃，万虑皆空，有时也像一帖清凉剂，能够（至少是暂时）稀释官场中的士人由于眼中的得失之心而产生的焦虑。试看欧阳修的《酬净照大师》：“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关。吾方仁义急，君且水云闲。意淡宜松鹤，诗清叩佩环。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间。”就明白地说明自己虽不相信佛教学说，但僧家淡泊的生活态度，以及在这种生活之中创造的清淡的诗境，还是令他非常追求的。在《题青州山斋》一文中，他也直截了当地

说：“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向往的无非也是佛寺的清幽。特别是当他政治失意时，更加别有会心，如《送昙颖归庐山》：“吾闻庐山久，欲往世俗拘。昔岁贬夷陵，扁舟下江湖。……圣君念苍生，贤相思良谟。嗟我无一说，朝绅拖舒舒。未能膏鼎镬，又不老菰蒲。羨子知所止，双林归结庐。”其实，这既不能看作欧阳修思想中存在矛盾，也不能夸大，说佛教对欧阳修的思想有多大影响，事实上，这就是古人，特别是唐代以来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往往已经抽离了具体的思想，而进入一种生活哲理的层面，也说明，从唐代以来，佛教往往已经成为了文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解了这一点，对于北宋的文人，就会有更加深入的思考。至于欧阳修的晚年，由于生活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和契嵩的辩驳讨论，思想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佛教有了新的认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北宋文人与佛教的关系密切，是当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关的，是北宋僧人的文人化。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从诗歌创作来看，这个特点尤其突出。人们讨论北宋的诗僧，除了其本身的身份认定，写作了与僧人生活有关的诗之外，还常常提到其创作的士人化，也就是并不把风格内容限定在一般对僧人的要求上。比较著名的，如道潜《秋江》：“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阳已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就写出了士大夫的羁旅行役之感。北宋时期，诗僧写诗，刻意与所谓“蔬笋气”，也就是僧人清寂风格保持距离者，非常之多，兹不缕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追求上，诗僧的自我认定往往是文人，而不仅仅是僧人，因此，在创作中，也就往往用世俗的诗风取向要求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宋诗僧惠洪。惠洪是黄庭坚的晚辈，非常崇拜黄氏诗学，也自觉地宣扬黄氏诗学，著名的“夺胎换骨”之说，就是他在《冷斋夜话》中提出的。惠洪也从黄庭坚学诗，能够“传黄鲁直法”。他的五七言古诗，都颇有黄庭坚的森严气象。僧人与文人之间的互动也在本书关注的范围之内，如果对诗僧的创作有所了解，则当然也能对当时文人的风貌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本书胜义很多，除了比较全面地思考了北宋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特别是具有一定的谱系意识之外，在某些特定的点上，也有所创发。比如王安石的诗歌成就，一直以来都得到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较大关注，但是，尽管人们普遍承认佛学与其诗歌创作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的具体研究却还不够充分，本书在王安石身上用力甚深，无疑对这个重要环节有所弥补。还有，苏门诸子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本来，人们都非常认同苏轼与佛教的关系，倘若能够将这个思路扩展到整个苏门，或者能够别有收获。这方面的研究，如黄庭坚与禅宗的关系，已经相对充分，但其他诸子，如秦观、张耒等，则就有所不足。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本书在这方面下的功夫，除了有助于人们认识苏门诸子之外，也有助于加强对苏轼本人的理解。

张煜于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所选取的论文内容是对清末民初陈衍诗学的研究。硕士毕业后，他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随陈允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陈先生学养深厚，对佛学与文学的研究，思致深邃，向为学界所称道。张煜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学问更有进境。这部书稿的不少部分，都与其博士论文有关。从讨论晚清诗学，到研究北宋文学，其间虽跨度较大，但也有一定的内在关系。陈衍论诗注重宋调，其著名的“三元说”，其中的元祐，正是北宋诗坛最繁荣的时候，也都可以和本书的一些思路互相启发。由此可见，张煜探讨北宋文人与佛学的关系，能够具有比较大的视野，这当然也就使他的思路更加开阔。自2001年从南大毕业，至今正好10年过去了。10年间，张煜过的是书生本色的生活，除了攻读博士学位，还分别在两所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从事教学研究之余，还做了不少英文翻译，致力于介绍海外学者的佛学研究著作。有了这些铺垫，他已经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也有较为开阔的视野，相信不久一定能够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张宏生

2011年3月17日于香港将军澳中心之片翠山房

前 言

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巩固阶段,隋唐的完成昌盛阶段,至两宋之后,已进入其实践和渗透阶段。以往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有着重视前两个阶段而相对轻视第三阶段的倾向。其实,佛教发展到了宋代,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融益加紧密,至元以后渐呈三教合流的趋势。除了民间佛教的继续推广,宋代士大夫与禅林的交游也更加密切,而佛教在思想、学术、文学、心态诸角度对文人的影响也愈益明显。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宋代士大夫鲜有不受佛教之影响者。又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朝代,陈寅恪先生至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①,虽然有的学者对这一论断表示不能完全赞同,但有宋一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北宋的学术与文化,如荆公新学、温公史学、苏门蜀学、二程理学等,可谓精彩纷呈;在文学方面,则自王安石至苏轼至黄庭坚,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技法已渐趋成形;而禅宗之临济、曹洞、云门三系,天台、净土二宗,至宋代亦是各擅胜场,继续朝前发展着。佛教

^① 《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为有宋一朝的文化形成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其实士大夫也为佛教增色不少，最后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种新的文化（姑且称之为“宋型文化”）在北宋朝形成了。它究竟有些什么特点？与之前、之后的文化有些什么重大区别？它是如何生成的，在生成的过程中，佛教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文化的意义何在？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这都是我要致力于探讨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北宋的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都应该有其特有的价值。

本书试图打通宗教与文学，探讨北宋文人在思想与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受到佛教的种种影响。北宋文人往往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又是诗人，故我将思想史与诗歌史作为重点论述对象。前贤们在唐代这方面的研究如郭绍林先生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①，是一部功力深厚的整体研究之作，比较注重历史的梳理。宋代佛教史方面，有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②、郭朋《宋元佛教》^③、顾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④、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⑤、李国玲《宋僧录》^⑥、[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⑦、杨曾文《宋元禅宗史》^⑧、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⑨等。尤其是杨曾文先生的著作，资料详尽，论述深入，堪称典范，故佛教史包括禅宗史不再是我探索的重点。又潘桂明先生的《中国居士佛教史》^⑩，搜罗宏富，但较少论及文学。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与演变》^⑪，详论宋代各派思想，又较少述及佛教之影响。周裕锴

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台湾学生书局 1989 年版。

③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⑥ 线装书局 2001 年版。

⑦ 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⑨ 巴蜀书社 2005 年版。

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⑪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先生专注于禅与诗学的研究,对我启发尤多,但比较偏重于北宋晚期之元祐诗坛^①。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先生们的研究基础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于北宋的思想、文学所受佛教的诸种影响,尝试做一个综合的论述。本书写作期间,恰逢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②、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③等书出版。因为我的研究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史与诗学,所以彼此重复的部分并不多。

又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二十世纪来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自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导其源,陈寅恪、季羨林、饶宗颐等学术大家在上个世纪在此领域多有所建树^④。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又有陈允吉、孙昌武、周裕锴、张伯伟等先生卓有成绩的研究^⑤。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论著仍可谓层出不穷^⑥。总的来说,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相互交融的最重要时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故不管是佛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都有着相对重魏晋南北朝隋唐、轻宋代的倾向。如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即是明证;在中国古代文

① 如《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②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如《海日楼札丛》卷七“韩愈游青龙寺赠崔群补阙诗”、“韩愈陆浑山火诗”,论韩愈诗歌与密宗之关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又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之《四声三问》,论佛教之传入,对中土诗歌音韵之影响,三联书店2001年版;《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论《三国志》受佛教故事之影响,载《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季羨林论佛典中的《五卷书》故事与中国相似故事之比较,参季羨林先生所译《五卷书》之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等,载《朗润瑣言》第26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饶宗颐《〈文心雕龙〉与佛教》、《文心与阿毗昙心》等,文载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如陈允吉师《唐音佛教辨思录》,论唐代如王维、韩愈、李贺等诗人之诗歌创作与佛教的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

⑥ 如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版。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等。

学研究领域，宋代文学的研究也相对比魏晋、唐要来得薄弱些。其实，宋代的佛教、文学、历史、文化皆有其重要研究价值，是近世的开端。近年来对于宋代的各种研究的开展，已经使之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本书可谓是在此学术大背景之下所催生。

我的研究方法采用了传统的哲学与文学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说理、考订与艺术分析相结合。在内容上，第一章概论部分，对北宋佛教发展的新趋势作宏观的考察。宋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与前代帝王相比，要来得更加地理智与成熟，基本是采用一套既利用又控制的手段（北宋末年虽有宋徽宗之抑佛，但因为历时不长，故影响并不大）；宋代的排佛与调和论者，其论点、论据也和前代有所不同，其总体趋势是三教进一步地融和，而至南宋理学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代士大夫更是鲜有不受佛教影响者，在这过程中，佛教本身也越来越走向世俗。本章所论述内容，虽前贤多有提及，但我使用了不少新材料，包括宋人笔记中的材料，笔记小说虽多得自传闻，但只要能够恰当、谨慎地使用，其史料价值却不容小觑^①。

在第二章思想史的个案研究中，我对教内教外的这种融合倾向进行了具体地展开，而集中于论述心性论。教内以五代末永明延寿禅师为代表，其佛学思想重视佛教内部诸派的融合，《宗镜录》集中贤首、慈恩、天台三家精义，而以“一心”统摄，以此来贯通整个佛学体系，实为唐宋佛学思想转折时期一承上启下、集大成之关键人物。晁迥致力于三教之兼融，而以佛教来横通儒道，可谓其特色。理学的很多特征，比如重义理、轻事功等，在晁迥的著作中，也多有所反映。从思想史的角

^①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认为小说家言具有“通性之真实”，“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周勋初先生《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讨探》中也认为：“笔记小说中确是记载着许多不经见的轶闻，虽似与常识有违，实则更为可信，可补正史之不足。这类轶闻常是反映出当时的民情风俗与时代风气，更能表现文士的心态，在正统史家的笔下是很难见到的。”载《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度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得风气之先者。儒家的心性论,发端于《四书》,到唐代,在韩愈、李翱手上获得发展,逐渐呈现儒、佛合流的倾向。宋代儒学虽有理学、心学与气学之分,但其主流是心学。南宋朱熹、陆九渊虽有“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但即使朱熹本人也承认“心”与“理”是可以统一的。这种心学化的趋向,与佛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北宋已肇其端。进入宋代以后,三教关系要处理的问题已经与魏晋、隋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理学受到佛教心学影响,心性论成了中国哲学的最重要基干,而三教越来越倾向融合。

之所以选择永明延寿为教内融合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确实是五代末至宋初最有影响力的教界人物,故设此一节,以觐宗教界之思想走向。《宗镜录》卷帙浩繁,《心赋注》中的观念亦多能与《宗镜录》相印证。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体会到永明延寿禅师故意将心、如来藏、阿赖耶识、佛性等观念打并作一谈,但是这种综合的功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创新。本节写作时主要参考了有关核心期刊与杭州佛学院所编之《永明延寿大师研究》^①。上世纪八十年代则有孔维勤所著《永明延寿宗教论》^②,九十年代冉云华先生所著的《永明延寿》,堪称是最权威之作^③。有关晁迥的研究,因目前尚无专书,则主要参考了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的第五章《晁迥对佛道思想的认识》。因我主要是从三教调和的角度立论,故从材料到观点均有不同,而立足点仍然是心性,即晁迥的复性思想。

而对儒家心性论的梳理,是本书的哲学主干。故向上一直追溯到孟子、韩愈、李翱,向下则一直延及南宋朱陆,乃至明代王阳明。我也知道这样写超出了北宋的范围,如此处理,只为让读者得以了解心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中的纵贯地位。我认为纵贯中国哲学的一个关键命题是心性问题,而不是唯物与唯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心

①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版。

③ 东大图书公司 1999 年版。

与物是不能截然区分的。而心性问题在两宋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尤其重要，不仅是最基本的范畴，而且直接关系士大夫的人格道德修养与生命价值取向，这其中有佛教的影响与贡献在。此部分虽然在整书中只有一节，但我的阅读量却不小，宋代诸如周敦颐、张载^①、二程^②、朱熹^③、陆九渊^④等的集子，等于都过了一遍。这期间，诸如赖永海《中国佛性论》^⑤、杨维中《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⑥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又论述北宋文学受佛教影响部分，我的侧重点是诗文，尤其是诗歌，而几乎不涉及词与小说；因为笔者以为禅与诗学是最富研究价值的研究课题，而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诗文是最主流的文体，最能够显示其精神祈向。至于佛教对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的影响，也几乎不在我的主要讨论之列，只是在考订文人与僧人交往时，偶尔对画僧、琴僧、书僧等有所涉及。笔者以为，北宋诗歌的主要成就在晚期，尤其是元祐时期，以苏门（以苏轼为代表）、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上溯元祐前之王安石，而北宋中期最杰出的诗人是梅尧臣，这些诗人在作诗技法上都有明显受到佛教禅宗影响的痕迹，所以可以勾画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来。北宋诗学前人在此已有不少的开拓，如许总《宋诗史》^⑦、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⑧等，我的特色在于较为全面地把握住了北宋诗人与佛禅相互交融的发展脉络。在概括出文学史普遍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个体的各别现象。并将江西诗派的源头追溯至北宋中期之梅尧臣，甚至欧阳修，指出其中的佛教影响。

①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②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③ [宋]朱熹、吕祖谦撰《朱子近思录》，严佐之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④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⑤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⑥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

⑦ 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⑧ 巴蜀书社 1997 年版。

在第三章诗歌史的具体个案分析中,初中期我是以梅尧臣为主体的。王禹偁是宋初文坛的第一人,白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主张而言,他是反佛的;但因为正直敢言,一生屡次受黜,多次外放,又使得他与佛教文化多有接触。作为文学史上西昆派的代表诗人,尽管杨亿一生笃信佛教,但佛教在《西昆酬唱集》中,并没有多少表现。倒是《武夷新集》中,有不少与僧人的赠答诗作,多用佛典,但仍写得清新流丽,与西昆体的风格迥异。欧阳修一生革新诗文,反佛倡儒,后人多有以唐韩愈比之者;而其一生与韩愈一样,与佛教人物又多有交涉。梅尧臣与僧人交往极多,其诗作注重平淡美,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对江西诗派也影响至深,其间佛教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对于王禹偁的研究参考书目有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①等。王禹偁是宋初的重要诗人,他虽然反对佛教,以儒家思想立身处世,但其实于佛教多有理解之同情,并认为“宦路无机即是禅”。杨亿与佛教,杨曾文《宋元禅宗史》第七章《宋代儒者士大夫和禅宗》有关论述以及杨一飞《杨亿年谱》^②对我均有帮助启发,只是我结合《武夷新集》,落脚点更多是在文学。在我看来,宋初这两位重要诗人,更多是承袭晚唐诗风,尚未能开出宋诗之面目。

又欧阳修是北宋中期的文学大家,除了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两书中有专节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外,严杰还著有《欧阳修年谱》^③。由于欧阳修是我必须讨论的个案,为了不与他人雷同,我首先从欧阳修与佛教人物之交往着手。得知欧阳修一生结识的僧人并不特别多,交往也不算特别深。其中一类是有某些方面才能的,而欧阳修与他们的交往,更多也是希望诱佛入儒;另一类则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所以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是有可能的,但绝不是佞佛。而在思想上,欧阳修反

①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南京出版社 1993 年版。

对佛教，反对空谈心性，代表了宋代一部分士大夫的正统儒学观念。而在文学上，则通过分析欧阳修游历佛寺、作诗之“不犯正位”等，探讨其文学之创新精神及与佛教之可能联系。

对于梅尧臣的研究，则主要参考了朱东润先生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①和《梅尧臣传》^②。梅尧臣对于佛教并不虔信，但一生交往的僧人与游历的佛寺却极多，且多付诸吟咏，显示了宋代士大夫公务之余，在方外寻求高情雅趣的倾向。而其诗作之“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更是开出其后江西诗派的无数法门。

第一至三章为上篇，其中除了对全书作出俯瞰式的概述外，在思想领域，则引出心性论的主线，以此为核心来阐述宋代的三教合一倾向；在文学领域，则以北宋初中期，尤其是中期的欧阳修、梅尧臣为主，来阐述宋诗的面貌是如何一点点明朗起来的，以及其中佛教尤其是禅宗所可能起到的催化作用。

本书之中篇着重探讨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这是我2004年毕业时的博士论文，也是此书之最早写作部分及主干。之所以要花这样大的力气来研究王安石与佛教，实因为北宋晚期之著名诗人如苏轼、黄庭坚，学界对他们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均已相对充分。而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与佛教的复杂关系则相对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而且无论在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所以设三章作专门的探讨。在此先将学界关于王安石的研究略微详作解析。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晚号半山，先后封舒国公、荆国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家与文学家。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曾两度拜相,主持了在宋代历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关于这场变法的是非功过,从他生前一直到现在,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他的学术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配合其改革,以兼收并蓄、注重功利而著称,与先后并起的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一同构成了北宋中后期学术思潮的中坚,其影响及于南宋,终因政治的因素而式微。王安石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诗、词、文均妙绝一时。梁启超认为:“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①

综观前人对于王安石的研究,其生平事迹史书记载甚详,年谱已有数种。其中最早的是宋人詹大和所做的《王荆文公年谱》^②,作于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1140年)其任抚州知州事任上,重刊《临川先生文集》之时。清雍正年间,锡山顾栋高先作《司马温公年谱》,基于他对司马光的崇拜,后作《王安石年谱》^③,以树立司马光的对立面,故不加考据,错误地根据《宋史·王安石传》以定王安石生年,实提早了两年。詹谱简略过甚,且有舛误;顾谱仓卒成书,讹误特多。至乾嘉年间,金溪蔡上翔历时二十二年,完成三十万言之巨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著书之目的,在为安石辨诬,“以王安石一代伟人,为新法受谤,慨然推本陆文安公之意,博考诸书,参互证明,以辨《宋史》之诬”^④。但他由于所见有关北宋的史书太少,未能充分利用南宋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资料,亦间有失考之处。此年谱在二十世纪很流行,成为研究王安石生平的重要参考书。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裴汝诚点校整理的《王安石年谱三种》,将上述三种年谱收于一书。近人如高文、高启

① 《王荆公》,《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七,第19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附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朝鲜古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③ 见沈卓然编《王安石全集》,大东书局1935年版。

④ 光绪《抚州志·文苑传》,载《王荆公年谱考略·新附》,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明撰《新编王安石年谱》^①、高克勤撰《王安石年谱补正》^②，对蔡谱多有匡正。

现存的王安石诗文集有两个系统：一种是“杭本”（递修本），另一种是“龙舒本”（原本），均为宋绍兴时刻本^③。“杭本”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王安石曾孙王珣重新刊刻的《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与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詹大和《（重刊）临川文集》刻本为同一体系，但要优于詹刻。今仅存残帙，但有多种元明递修全本，其中尤以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何迁刻本《临川先生文集》为最著名，《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所收即为何本。“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要早于“杭本”，刻于庐州舒城县（今属安徽），但宋以后流传绝少，至今世间尚存两个残帙。国内残本为清光绪年间宝应刘启瑞“食旧德斋”所藏，民国间由傅增湘将刘氏原本拍摄成玻璃片，外间才有流传，此刘氏旧藏今藏上海博物馆。国外残本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从日本东洋文库得到其胶卷，将两部残本相合，去其重复，使其成为一部完书。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傅增湘所摄玻璃片，依北京图书馆所藏胶卷补足缺卷，影印出版，使得传本几绝的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复行于世。1974年由唐武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的《王文公文集》，即以龙舒本为底本。“杭本”与“龙舒本”虽同为 一百卷，但编次迥异，篇目亦多有出入。故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临川先生文集》，又以岛田翰、陆心源、朱孝臧、唐圭璋等人所辑王安石诗、文、词佚篇，集成《临川集补遗》一卷作为附录。

南宋宁宗时李壁给王安石诗作笺注，是流传很广且非常著名的宋人注宋诗。李壁注本宋刻业已失传，元刻本也只能看到大德五年

① 《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② 《文献》1993年第4期。

③ 详参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